



引用格式: 聂海杰.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存在论意蕴[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2): 28-35.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0.02.00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20)02-0028-08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存在论意蕴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 of Kant's "Copernican revolution"

聂海杰

NIE Haijie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从哲学的主题和问题域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内蕴着为传统西方哲学进行形而上学奠基的存在论向度。康德的这一奠基工作包括三个环节:将一般对象划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对象和领域进行存在论的勘察;追溯思维的主观条件所具有的客观有效性的先天根据,对“先天综合判断”成立的根据进行存在论的规定;分析先验的图型联结感性和知性的原理和机制,对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的内在统一性进行存在论的演绎。作为这一奠基的成果,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变革意蕴。一是克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为西方哲学重新赢获了形而上学的地基和领地;二是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性,从存在论层面确证了人的自由;三是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德国的哲学革命,赋予西方哲学以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内涵。

关键词: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存在论;
哥白尼式革命;
形而上学

[收稿日期] 2019-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XB09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20185HQ005)

[作者简介] 聂海杰(1981—),男,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哲学基本理论。

人们通常从一般哲学史视角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归结为“认识论变革”。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诠释并未真正抓住康德哲学思想的内涵与本质。从康德解决近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疑难”出发,我们可以将其“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奠基,由此从不同于认识论的存在论维度彰显康德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内涵和变革意蕴。

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内蕴的存在论向度

通常对康德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一般着眼于认识论层面,认为“康德设法在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建立某种综合,其办法是避免在他看来经验论所具有的怀疑论和唯理论所具有的独断论”^[1]。人们认为,康德通过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以先验的认识论实现了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变革。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理解并未真正触及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实质。“《纯粹理性批判》与‘知识理论’完全没有干系。……《纯粹理性批判》不是一种关于存在物层面上的知识(经验)的理论,而是一种存在论知识的理论。”^[2]^[13]据此,海德格尔反对从认识论层面观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强调应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把握康德哲学革命的内涵与本质。

康德哲学的问题域和主题源于近代西方哲学。以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经验论者),共同地将“知识和观念起源于经验这样一个原则”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倾向^[3]^[57]。他们的论敌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派(唯理论者)。这些哲学家所信奉的是与经验派截然相反的认识论原则:“凡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都不能从感觉经验得来而只能起源于理性本身。”^[3]^[67]经

验派和理性派以不同的哲学认识论原则为逻辑前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争。但若深究之,会发现这两个派别并非截然对立:两派的论争是以承认人类知识的必然性和真理的实在性为前提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对必然性的知识与真理的来源之关系的认识不同。休谟的怀疑论终结了两派的论争。休谟从经验论的认识论信条出发意图彻底地证明知识的“经验源泉”,得出的却是反经验论的结论。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实体”不过是理智凭借习惯性而产生的概念,它并没有绝对的实在性;“主体”实则是观念在想像中的恒常结合,所谓“自我”不过是“一束知觉”;因果关系不过是人类心理习惯的产物,从“原因”无法逻辑地推出其“结果”,从“结果”也无法逻辑地追溯其“原因”。“理性在这一概念上完全是在欺骗自己,它错把这一概念视为它自己的孩子,而实际上这一概念无非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凭借经验而受孕,把某些表象置于联想规律之下,并把由之产生的主观必然性,亦即习惯,硬说成是洞察到的客观必然性。”^[4]^[3]休谟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前提得到的却是颠覆性且充满破坏性的结果,“休谟就以此方式瓦解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运动围之而旋转的两大基本概念。……这样一来,通常的形而上学的基石完全垮台了”^[5]。休谟的怀疑论在否定理性派的认识论之际,也否弃了经验派的认识论。于是,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就因其形而上学地基的坍塌而陷入困境和危机。

康德敏锐地洞察到休谟怀疑论对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的冲击力。他认为,“自从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到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6]^[5-6]。康德曾是沃尔夫主义者鲍姆加登的

追随者,受休谟的怀疑论的启发,他得以摆脱“教条主义的迷梦”,开始踏上批判哲学的道路。康德并未陷入休谟的怀疑论,而是着手将解决“休谟问题”作为自己的批判哲学的根本任务。康德不甘心休谟将“哲学之舟”弄到浅滩(怀疑论)上,让它躺在那里烂掉,而是决心让“哲学之舟”重新扬帆启航。“对我来说关键在于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备有一张详尽的海图和一个罗盘,将根据从地球知识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则,能够随心所欲地把船安全地驾驶到任何地方。”^{[4]7}也就是说,康德要为摇摇欲坠的西方哲学大厦进行奠基,将它从休谟的怀疑论中解救出来。

康德对西方哲学进行奠基采取的方式是“纯粹理性批判”。对此,他指出,“但我所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纯粹理性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7]3}。区别于传统上基于认识论向度的解释,海德格尔力图从现象学视角挖掘康德这一批判内蕴的存在论向度。“形而上学的奠基在整体上就叫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这就是在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Kopernikanischen Wendung)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2]8}海德格尔强调,康德的批判哲学并非要提供一个比近代哲学更加完善的认识论体系,而是要追问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一追问必然推动着康德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前提进行存在论批判,由此就深入到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之中。“在这样开始为形而上学奠基之际,康德就使自己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展开了直接的对话。现在,存在论第一次从根本上成了疑难,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第一次也是最内在的震

荡。”^{[2]8}因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学体系,而是对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构建哲学体系的理论建制的前提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并非是在消极地消解传统西方哲学的真理性,而是在积极地对哲学家们所遗忘和出离的形而上学根基进行存在论的奠基,为整个西方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与发展的可能性、现实性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康德对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方式

海德格尔将康德为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方式比作“建筑术”,认为康德是“为这一自然的形而上学置入一个基础”,实则是“用一个新的基础替换掉那旧有的”基础,而他的这一“作为建筑计划之筹划工作的、形而上学奠基,却绝不是对某个体系及其内层的空洞建造,而是对形而上学之内在可能性所进行的建筑术意义上的划界与标明,这就是说,去具体地规定形而上学的本质”^{[2]2}。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康德为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任务,而且也展现了康德实施这一奠基工作的方式。康德的任务是为西方哲学的“内在可能性”亦即其作为“第一科学”的真理性提供存在论的确证,而他进行确证的方式就是对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本源和条件提供存在论的逻辑演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此作了集中和深入的说明。他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传统哲学走出困局提供了范例和榜样。它们的成功、它们作为理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依赖于数学家们和自然科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变革。那么,哲学也可以像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聚焦于对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于是康德就抛出了他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构想:“向来

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东西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康德对此强调指出,“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7]13}。哥白尼最初是采取传统方式去进行天文学研究的,即假定星体是围绕着观测者旋转的,这样的假定无法认识天体运行的规律。于是他翻转和颠倒了传统的信条:让星体静止不动,让观测者围绕着星体旋转。哥白尼凭借这一思维方式的颠倒而获得了成功。这一做法给予康德以极大启发。康德认为,哲学研究也可以仿照哥白尼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个类似的翻转和颠倒,“现在,在形而上学中,当涉及到对象的直观时,我们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试验一下”^{[7]13}。哲学领域面临着与哥白尼当年近乎一样的情况。以往的哲学家们(此处意指经验论者)都认为感性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形状,这样的假定使得他们根本无法确立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但如果采取相反的假定,即假定作为感官的客体的对象必须依照主体的直观能力的形状,困境就得以克服了。这个新的假定的成立意味着必须进一步破除传统哲学的教条(此处意指唯理论者),即必须同时对用来对感性直观进行统摄的概念与对象的关系进行同样的颠倒。也就是说,不是概念依照对象,而是截然相反,即直观到的诸对象和全部经验都是依照概念的。康德告诉人们,像哥白尼那样,他基于这一新的假定所进行的“试验”成功了,“这一试验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了……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

道路”^{[7]14}。通过在哲学领域内实施这样一个“哥白尼式革命”,康德认为就可以破解“休谟问题”,将西方哲学奠定在全新的形而上学地基之上。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其所展开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其实施方式而言,它的根本性质是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康德不是简单地颠倒所谓主体与客体、对象的关系,而是要为二者的符合关系提供存在论的依据和支撑。康德所分别赋予感性直观和概念的先天地位和功能,实则是要“将那存在物的存在法相〈Seinsverfassung〉预先给了出来……那使得与存在物的关系(在存在物层面上的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那对存在法相的先行领会,就是存在论的知识”^{[2]11}。康德并未否定哲学作为“第一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意图通过存在论奠基的方式确保其科学性。他仿照哥白尼所进行的翻转和颠倒工作,不过是重申了哲学一贯所坚持的形而上学原则或原理,“存在物的知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某种存在论的知识存在”^{[2]9},其目的是通过彰显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而为其赢得尊严。因此,康德的奠基工作并不是要否定传统西方哲学的真理观及其认识论架构。“经过哥白尼式的转向,‘古老的’在使知识与存在物‘相符合’〈adaequatio〉的意义上的真理观所受到的冲击极少,以至于可以说哥白尼式的转向正是以这一真理观为前提的,甚至,它首先就是植基于这一真理观的。”^{[2]9}康德的这一奠基工作不是确立关于存在者的知识,而是要确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知识,是要揭示存在者存在的先天根据,为知识与对象的“符合关系”给予存在论的确证,即要确证“诸对象,亦即它们的存在物层面上的可规定性,必定会和这一后一种关于存在法相的知识相符合”^{[2]9}。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的确立是必须以存在论层面的知识为

前提条件的,存在物层面的真理是围绕着存在论的真理而旋转的。如果没有存在论层面的知识作为保证,主体关于对象和客体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就根本无法确保,因而哲学就不可避免地遭受休谟的怀疑论的打击。对于康德来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构建一个哲学体系,而是要通过这一必要的存在论的奠基,构建一门能够规定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科学,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康德这一奠基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对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必要的存在论勘察。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康德暗示这一勘察本身带有“反柏拉图主义”的色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排除了一切感性认识的可靠性,他们把这种可靠性限制在非感性认识或者知性理念的领域,最新哲学把这种可靠性从这个领域驱逐出去,仅仅在感性世界才接受它。”^[8]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提出了批评:“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双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7]6}康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根本性批判,他不是针对其具体观点,而是反驳其将哲学的对象和领域设定为理念世界的哲学观的做法。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于西方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9]。基于此,康德将哲学的对象和领域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转移到“感性世界”,其所带来的是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建制的颠覆。然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康德这是要彻底否弃“柏拉图

主义”。康德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实质上是为包括柏拉图理念论在内的全部西方哲学体系进行存在论的奠基。康德并非要将哲学建构成为关于“感性世界”的存在物层面的知识,而是要通过将一般对象划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来对“感性世界”的实在性进行必要的存在论的设定。“我们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来设想对象,也就是或者设想为现象,或者设想为自在之物本身。”^{[7]18}康德的这一存在论设定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前提构件,问题在于,将自在之物与现象二分的存在论根据又是什么呢?

这一问题推动着康德对“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成立的根据进行存在论的设定。“康德将存在论的可能性之疑难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2]9}康德认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从主词和谓词的关系看,哲学不是分析判断,也不是经验性质的综合判断,而是源于纯粹理性的“先天综合判断”。传统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纷争和困局,并最终倒向休谟的怀疑论,其根本原因是缺失对“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进行预先的考察。康德批评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没有对“先天综合判断”成立的存在论根据予以反思,“一切形而上学家都要庄严地、依法地把他们的工作搁下来,一直搁到他们把‘先天综合知识是怎样可能的?’这一问题圆满地回答出来为止”^{[6]35}。康德认为,这是一个被以往全体哲学家们都忽略了“秘密”,而“只有揭开这一秘密,在纯粹知性知识的无限领域中的进展才会变得确实可靠:这就是要以固有的普遍性来揭示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根据,洞察使先天综合判断的每一种方式得以可能的诸条件,并且,把这整个知识(它构成自己特有的类)按照其本源的来源、划分、范围和界限表明在一个体系中,不是通过某种粗略的轮廓来表示,而是作出完备的和对

于每种运用都充分的规定”^{[7]9}。康德所进行的这一存在论设定,需解决的是这样一个中心课题,即“思维的主观条件怎么会具有客观的有效性,亦即怎么会充当了一切对象知识的可能性条件”^{[7]74}。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分两个步骤、从两个维度——“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对此进行论证和解决的。具体而言,“先验感性论”是既要确证感性直观是知识与对象得以发生联系的初始条件,又要解决主体如何先天地直观到对象这一疑难。康德的答案是,纯直观、时间和空间是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要素。“这样,康德就第一次赢得了存在论的,而不是感觉层面上的感性概念”^{[2]23},找寻到了“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构件。“先验逻辑”的任务是要“把纯粹知性概念(并与它们一起把一切先天理论知识)演示为经验的可能性原则,而把这些原则演示为现象在一般的空间和时间中所进行的规定——最后,把这种出自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原则的规定,展示为与作为感性的本源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知性的形式”^{[7]98-99}。康德据此得出的“一般经验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之可能性的诸条件”^{[7]133}的结论,确证了“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成立找寻到了先验的原理支撑。康德由此就追溯到了“先天综合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从而找寻到了“一般形而上学得以可能”的存在论根据。然而,这两个条件即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概念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将二者联结起来、使得它们发挥作用的呢?

这一新的疑难是康德的奠基工作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解决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的内在统一性问题。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这二者具有显而易见的对立性。纯粹知性概念是根本超越于经验性的直观和纯粹直观的,前者与后者有本质区别。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存

在论疑难:“把直观统摄到那些概念之下、因而把范畴应用于现象之上是如何可能的呢?”^{[7]121}康德认为,解决这样一个对于哲学来说“自然而又重大的问题”的办法,就是“必须建立一门判断力的先验学说”,它的任务是为“知性概念如何能一般地应用于现象之上”的“可能性”^{[7]121-122}提供存在论的根据。作为感性的纯粹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本身,只有首先联结起来,主体才能直观到对象、才能对现象进行“再生的综合”而形成经验,这必须通过想象力才得以可能。“一种属于想象力的普遍的纯先验的综合,是我们的经验想象力对于一定现象的表象所进行的再生综合的可能性条件。”^[10]对于知性而言,由于知性之所司在于思维而非直观,那么知性将如何作用于经验对象呢?亦即知性如何与经验对象相结合而将个别纳入一般概念之下?问题的实质是,知性与感性如何才能联系起来,纯粹知性概念与纯粹直观形式如何才能联结起来?康德的答案是:二者的联系和联结必须通过范型,亦即“先验的图型”。“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知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7]122}“先验的图型”是感性和知性、纯粹直观和纯粹知性范畴得以统一的必要中介,它使得范畴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对现象进行概念统摄。“因此,超越论的想象力是根基,存在论知识的内在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都建基在它之上。”^{[2]121}于是,康德就实现了自己“纯粹理性批判”的目标,即基本完成了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哥白尼式革命”。

三、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变革意蕴

作为对传统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成

果,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传统西方哲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效应。“如果《纯粹理性批判》不能改变世界的话,至少它也将会改变哲学。”^[11]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它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深刻地变革了传统西方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克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均意图通过对主体、对象的本质及其“符合关系”的认识论解析,解答“我们何以能够确立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形而上学之谜”。然而,哲学家们都独断地将思维与存在的“符合”作为既定的理论前提,都忽略了对二者符合的根据、原则和机制的前提勘察,以至于他们所精心构建的哲学体系在休谟的怀疑论的攻讦下纷纷瓦解。如何破除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独断论幻想,如何应对“休谟问题”对西方哲学的打击,这一疑难不仅直接地关乎哲学曾经作为“科学之科学”的荣耀地位和至高尊严,而且从根本上关乎到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命运:它既然无法确立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知识,又凭什么为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提供真理依据呢?康德破解了这一发生在形而上学内部的根本疑难。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不仅克服了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因其非批判的认识论所导致的独断论幻想,而且为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全部先天知识的实在性及其真理性奠定了存在论前提和基础。康德所完成的“哥白尼式革命”克服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危机,使得西方哲学重新赢获了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和领地。

其二,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性。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思想家们就将争取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他们在政治、宗教、法律领域与封建势力和专制者抗争的根本鹄的。康德继承了这种启蒙精神,将之作为根本理念贯彻到了

其批判哲学之中,赋予其形而上的意蕴。康德深刻地将“启蒙”的本质界定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将人们打破束缚的方式诉诸于“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2]。康德明确地将“替一切人恢复其作为人的共同权利”^[13]作为其批判哲学的根本旨趣,其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内含着为人们实现自我超越的类本质提供存在论确证的深深刻意蕴。表面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在抽象地追问“主体何以能够获得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这样的理论问题;然而,在康德的这一先验追问之中却蕴含着西方将哲学的主题从物转向人、从自然转向社会的张力,亦即“展开了介于物和人之间的一个维度,它越向物并返回到人。”^[14]康德仿照哥白尼将主体与对象关系的颠倒,他所赋予感性直观、知性概念的先天属性和存在论功能,决不是仅仅为了确证对象的实在性,而是基于“哲学是使一切都从属于自由”^[15]这一信念,将西方哲学的主题由“物是什么”变为“人是什么”,将哲学家们的视野从超验的存在物(自在之物)移回到人身上。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评判的,康德这种充满先验特质的存在论哲思有其深刻性,实则是把主体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16]499},从而展现了人超越于物的主体地位,基于哲学的存在论层面凸显了人的自由。

其三,赋予西方哲学以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内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17]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本源动力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推动着他别出心裁地要在哲学领域发动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这就深化了对问题的思考,促使我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审视康德为西方哲学进行存在论奠基的时代意义。康德对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奠基,直接动力是应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困境,根本动力则是应答18世纪西方

社会发展所涌现出的时代课题。“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16]89}。这场革命的实质是资产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在欧洲各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在英国表现为社会革命,“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16]89}。康德对西方哲学进行的存在论奠基,基本上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求解。康德可谓是当时普遍发生于西欧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代言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可谓是将欧洲社会领域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德国的哲学革命,从形而上的高度对欧洲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资产者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作出哲学求解。“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7]19-20}。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而完成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以一元论的形式将知识(哲学)和信仰(宗教)融为一体,而是以先验的二元主义的存在论构思使二者并存;这样的做法固然反映了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不彻底性,然而并不能掩蔽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西方哲学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在康德的《批判》的高温下,旧世界已经消融了。”^[18]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固然没有映射出“新世界”的曙光,却在形而上的维度上给予“旧世界”以存在论批判和打击。这是康德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贡献,也是康德哲学应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G·希尔贝克 N·伊耶. 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 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67.
- [2] 海德格尔.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 王庆节,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 陈修斋.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4]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释本)[M]. 李秋零, 译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5]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M]. 罗达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657.
- [6]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7] 康德. 三大批判合集(上卷)[M].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康德. 康德书信百封[M]. 李秋零, 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5.
- [9]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82.
- [10] 齐良骥. 康德的知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71.
- [11] 库恩. 康德传[M]. 黄添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81.
- [12]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3.
- [13] 斯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9.
- [14] 海德格尔. 物的追问: 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16.
- [15] 亨利希. 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70.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0.
- [18] 平卡德. 德国哲学 1760—1860: 观念论的遗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39.